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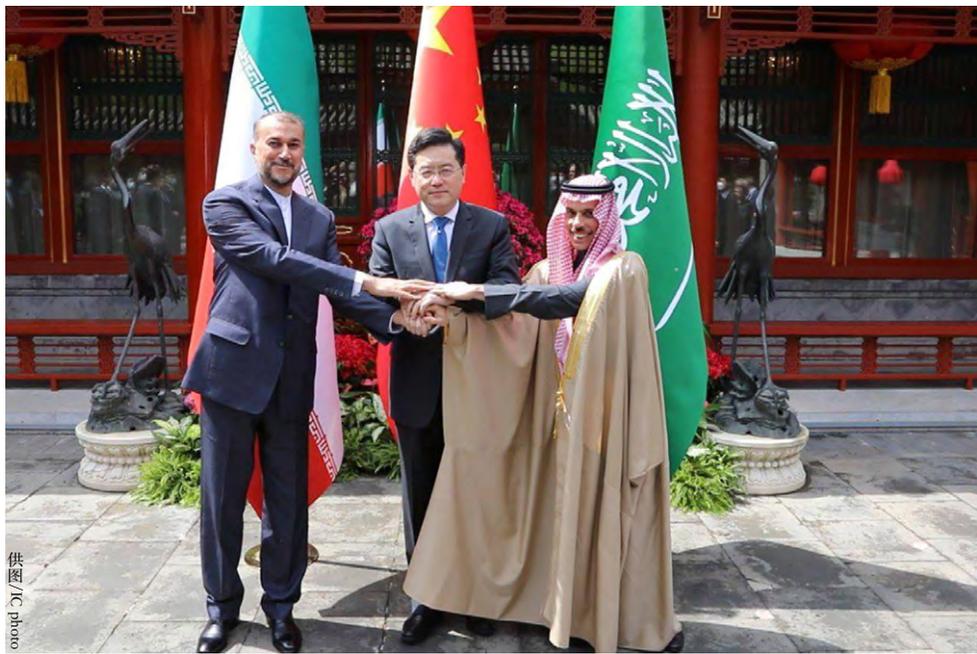
“后美国时代”中东地区秩序加速演进

文 / 唐志超

2023年4月6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集体会见来华举行外长会晤的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会晤后，两国宣布即日起恢复在2016年断绝的外交关系。此前的3月10日，在中方积极斡旋下，中国、沙特、伊朗在北京发表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和伊朗同意恢复外交关系，并将在至多两个月内重开双方使馆和代表机构、安排互派大使等。此消息公布后，在全球激起广泛积极反响。沙伊这一对“中东夙敌”宣布复交，不仅意味着中东地区以沙特与伊朗为轴心的两大对抗阵营走向和解，也反映出“后美国时代”中东地区秩序正加速深入演进，新的中东地区格局正在酝酿。

中沙伊北京对话助推“缓和潮”

长期以来，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地缘政治矛盾丛生是中东政治的显著特征。从总体上看，该地区国家间的关系以民族、宗教划线，以色列—犹太教与阿拉伯—伊斯兰教、逊尼派—阿拉伯与什叶派—波斯是中东传统的两大对立阵营。不过，自进入本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内部的地缘政治关系日趋复杂。尤其是在本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随着美西方与



供图 / IC photo

2023年4月6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集体会见来华举行外长会晤的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与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会晤后，沙伊两国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

中东国家间的矛盾有所降温，地区国家间的矛盾骤然上升、冲突加剧。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轴心与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以色列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土耳其与地区国家之间的矛盾构成中东地区的三组主要矛盾。伊朗、沙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土耳其分别成为地区三大对立阵营的领袖。这三大矛盾持续发酵，不仅导致地区国家间关系恶化，还严重危及地区稳定、加剧地区冲突，“代理人战争”频繁发生。

在北京对话举行之前，缓和

已成为地区国家间关系阶段性调整的重要标志。其中的关键性标志是近年来土耳其与阿联酋、沙特、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关系的改善；与此同时，借助2020年9月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在美国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四国相继建交，与沙特、阿曼的关系亦有所改善。此外，叙利亚与阿联酋、科威特和阿曼也恢复了外交关系。

此番沙伊宣布复交则开启了中东又一对立阵营的和解进程，其外溢效应极大加速了中东地区

的“缓和潮”进程，和平悄然成为地区主旋律。

一是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与叙利亚关系出现改善，叙重返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指日可待。例如，3月13日，沙特与叙利亚已开始推进重开使领馆和恢复航班往来等事宜；3月18日，叙总统巴沙尔访问阿联酋，这是其12年来首次出访阿拉伯国家；4月1日，叙外长梅克达德访问埃及，这也是其自2011年叙内战爆发以来首次访埃；4月3日，突尼斯总统凯斯·赛义德要求启动驻叙大使的任命程序，加快与叙复交进程；同时，沙特也拟邀请叙出席将于5月在其首都利雅得举行的阿盟峰会。

二是也门冲突出现进一步降温熄火的积极迹象。4月9日，沙特驻也门大使贾比尔率领代表团与阿曼官员一同抵达也门首都萨那，与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迈赫迪·马沙特举行会议，讨论续签2022年10月到期的停火协议等内容。这是自2015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该国首次公开接待沙特官员。此外，4月14日，也门冲突双方还在瑞士日内瓦达成交换战俘协议。根据协议，胡塞武装将释放包括沙特籍人员在内的约180人，也门政府和多国联军方面释放700余人。双方还将于5月就交换更多在押人员进行谈判。

三是土耳其与埃及、叙利亚、以色列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

善，这将有助于叙利亚冲突降级。4月13日，埃及外长舒凯里抵达土耳其进行正式访问；而一月前的3月18日，土外长十年来首次访埃，访问期间，土埃一致同意尽快恢复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并将推动两国元首在2023年下半年举行会谈。此前的2022年11月，土总统埃尔多安与埃及总统塞西在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实现会面，外界普遍认为两国有望结束十年紧张对峙。同月，埃尔多安表示，土叙关系也可像土埃关系一样，逐步恢复。而在更早的2022年8月，土耳其与以色列也宣布恢复外交关系。

地区秩序重建的十年

早在19世纪，美国就开始介入中东事务，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大规模介入。冷战结束后，美国借助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一举确立了在中东的“霸主地位”。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则揭开了美国与中东关系的新一页。2001年与2003年，美国分别发动阿富汗战争与伊拉克战争，这使美国对中东的大规模直接军事介入达到“史上巅峰”，却也成为其在中东影响力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2008年，奥巴马赢得美国总统大选，此时的美国已开始对中东萌生退意。2009年，奥巴马在埃及最高学府开罗大学发表以“新开端”为主题的演讲，正式宣告美国有

意掀开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新篇章。结束在中东发动的战争成为此后美国历届政府的主要任务。2013年，随着奥巴马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推出“亚太再平衡”政策，美国正式开始实施中东战略收缩，这也预示着中东开始步入“后美国时代”。

此后至今，是“后美国时代”中东地区秩序重建的十年。在这一时期，虽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未见明显减少，但美国在该地区进行外交投入、冲突干预、秩序重塑的意愿显著下降，其地区影响力也同步下降。以“世俗民主”为旗帜的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不再被地区国家膜拜，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性日益增强，外部大国在中东的“一超多强”格局逐渐被多极化新格局取代。虽然自2017年起，美国两任总统特朗普和拜登皆希望扭转这一历史进程，但最终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失败。

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后美国时代”中东秩序加速演进，并发生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要事件。例如，中东国家在乌克兰危机中普遍持中立态度，不愿追随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中东国家普遍不愿在美对华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还决意与中国全面加强战略合作；以沙特、阿联酋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员国在新一轮“全球能源大博弈”中拒绝以美国利益为先，一再回绝

美国阻止其减产石油从而压低国际油价、并限制其与俄进行能源合作的无理要求；伊朗、沙特、埃及、阿联酋、卡塔尔、巴林和土耳其等十多个中东国家相继提出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阿联酋、沙特等国不顾美国的反对，执意与叙利亚复交或准备复交等。美国在伊朗核问题、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利比亚问题等地区热点问题上的影响力明显下降。

沙伊在北京宣布复交则是“后美国时代”加速演进的最新标志性事件。沙伊和解不仅意味着美国长期致力于在中东地区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走向了死胡同，也标志着一段时期以来美国组建的“反伊朗地区联盟”与打造地区秩序新架构的努力遭到严重挫败。这表明，美国在中东已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发号施令，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和伙伴越来越多地开始选择依据本国利益自行其是，日益偏离美国的战略轨道。

未来五大发展趋向

进入本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中东地区格局持续演变，地区内外国家间关系进行深刻调整。未来一段时期，中东战略格局发展演变将主要有如下特征：

第一，中东地区在全球层面的战略重要性将持续并有所提升。长期以来，中东便在国际政治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近年来，由于美国在该地区实施战略收缩并将战略重心东移至“印太地区”，中东的战略地位似乎有所下降。但从现实来看，近两年，由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与全球能源格局调整，中东的战略地位不降反升。2022年美国、俄罗斯、中国等世界大国领导人纷纷到访中东，越发凸显出中东的战略重要性。本世纪截至目前美国中东政策的摇摆也充分显现，纵然美国一再希望撤下中东，但却一直难以如愿。这也是乌克兰危机升级后，拜登在2022年7月被迫出访中东的主要动因。

第二，地区“缓和潮”将加速进行、“诸侯争霸”现象将有所缓解。沙伊和解具有强大示范作用，不仅会带来也门、叙

利亚、黎巴嫩和伊拉克局势的缓和，也可能助推土耳其与其周边国家关系缓和，并对阿尔及利亚与摩洛哥的紧张关系产生积极影响。从短期看，叙利亚能否顺利重返阿拉伯大家庭最令外界期待；从中期看，也门冲突各方能否实现全面长期停火或达成政治解决协议最受国际社会关注。过去十年，土耳其、阿联酋、沙特、伊朗的“四强争霸”导致地区和平稳定遭遇重要挑战。在未来一年，这一不利状况将得到很大改善。

第三，地区国家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的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对美路径依赖和安全依赖减少，对外关系政策也正酝酿重大改变。传统上，美国与其地区盟友和伙伴在地区重大事务上能开展战略协调，保持一致性。但在最近一个时期里，中东各主要国家在发展与中国、俄罗斯、伊



2023年4月9日，沙特驻也门大使贾比尔率领代表团与阿曼官员一同抵达也门首都萨那，与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迈赫迪·马沙特举行会议。图为与会众人合影。

朗、叙利亚、上合组织等各方的关系时与在处理国际能源事务上，不顾美国的反对，越发坚定维护自身利益和安全，坚持推行独立自主的多元平衡外交，持续推行“向东看”政策。

第四，地区国家将加速本国发展转型，重新寻找适合自身政治身份定位的新战略。在本世纪经历过痛苦的20年战争与冲突后，中东国家开始痛定思痛，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埃尔多安执政下的土耳其是较早开始这一探索的先行者。如今，沙特、阿联酋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与埃及等国也紧随其后，开始探索更符合本国国情且兼容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现

代化发展之路。

第五，大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博弈进入新阶段，“一超多强”加速向多极化方向演变。拜登政府曾明确宣布将阻止中俄在中东“填补权力真空”，并采取各种措施阻挠地区国家与中俄合作，但拜登政府的这一目标连连受挫。目前，虽然美国仍在该地区维持着霸权地位，但其中东秩序新架构、地区盟友体系和红海—海湾地区安全政策均面临重大挑战，地区国家离美、远美倾向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过去十年里，俄罗斯通过介入叙内战全面重返中东。虽然目前俄面临美西方制裁等不利因素影响，与

地区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合作障碍增多，但其中东政策基础仍较为坚实。同时，中国虽然面临美国的打压围堵，但在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2022年12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沙特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并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外界普遍将之称为“三环峰会”。这些峰会的成功举行，与中方成功调解沙伊矛盾，不仅是中国中东外交的重大突破，也是中方在中东对美斗争取得两个回合的重大胜利。^[7]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发展与治理中心主任）

沙特、伊朗矛盾根深蒂固的历史经纬

文 / 刘中民

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矛盾根深蒂固，它不仅是中东政治的结构性矛盾，更承载着阿拉伯民族与波斯民族、伊斯兰教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千余年的历史恩怨。了解沙伊矛盾的历史经纬，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沙伊和解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千年恩怨之始

尽管伊朗和沙特作为现代国家的历史都不足百年，但双方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却已有近1400年之久。作为伊朗前身的波斯帝国最

早可追溯至由居鲁士大帝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330年），该王朝后为马其顿帝国所灭，随后伊朗进入希腊化时期。公元3世纪，波斯人又建立了强大的萨珊王朝，而灭亡萨珊王朝的正是在公元7世纪崛起的阿拉伯帝国。

波斯人在皈依伊斯兰教后，选择了该教两大派别中的什叶派。在伊斯兰教中，占据主流的逊尼派与处于边缘地位的什叶派最初的核心分歧在于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哈里发（即继任者）的产生方式：逊尼派主张通过推选的方式选择贤能担任，什叶派

则主张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为首位合法的哈里发。

在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公元661~750年）时期，波斯地区在帝国内处于边缘化地位。在阿拔斯王朝（公元750~1258年）时期，伴随着帝国中心从大马士革东移至巴格达，当时在文明程度上更加先进的波斯人在阿拉伯帝国的官僚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在后世的逊尼派保守派和激进派看来，正是波斯人深入阿拉伯帝国内部并对其进行“腐蚀”，才使帝国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并最终导致自